

書叢古籍衡

張籍集注

〔唐〕張籍著
李冬生注

I222.742
264

3

张籍集注

李冬生注

黄山书社

一九八八年·合肥

B 702201

责任编辑：胡贯中
装帧设计：宋子龙
封面题字：黄一民

张 籍 集 注

李冬生 注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杏花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50,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

ISBN7-80535-087-6/I·20

定价：4.30元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伟大祖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成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爰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丛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印，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亦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印安徽古籍丛书。最其体例，约有数端。

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地域，以现行省区为准。时间，一般以成书于「五四」之前为限。内容，以文、史、哲为主。

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或注释，尤注意于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校勘，力求

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

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

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七月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张凯帆 苏桦 侯永 崔剑晓 杜维佑 李广涛 郑淮舟 胡坦

主任 光仁洪 潘锷璋 丁继哲 傅大章 陶若存 李天民 王惠鹏

副主任 魏心一 陶有法 蔡德麟

委员 黎洪 吴孟复 金隆德 鹿世金 刘景龙 祖保泉 贾文昭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事长 苏粹

副理事长 胡坦 潘锷 丁继哲

秘书长 朱扬

理事 钮涟 马素英 潘培咸 田照临 张振明 张继忠 张立一

陶显斌 张其果 张金环 胡云龙 李庭荣 郑英保 孙智林

陈昌茂 沈基政 万洪翹 李炳忠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王子野 马茂元 胡道静 吴小如 舒芜 殷焕先 宛敏灏

主任委员

张涤华 蒋元卿

副主任委员

吴孟复 金隆德 祖保泉 贾文昭 施培毅

委员

刘学楷 孙文光 朱一清 傅玉璋 徐凌云 殷呈祥 汪福润
李明回 梁垣祥 沙宗复

前 言

(一)

在中唐诗人中，张籍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说复杂，不是指他的籍贯，他到底是哪里人，是和州乌江人，还是苏州吴县人，抑是河北濮阳人，我以为这都无关紧要。当然，根据史料考证，我们是把他看作和州乌江人的。说复杂，是指自唐以来历代诗评家对这位诗人的评价很不一致，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这位诗人的作品，如何确定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和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在中唐诗人中，张籍是名重一时的。韩愈赞扬听朗诵张籍的诗“未必不如听吹竹弹丝敲金击石也。”（《代张籍与李浙东书》）白居易对张籍的乐府诗推崇备至：“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辞，举代少绝伦。”（《读张籍古乐府》）姚合则认为张籍的诗“古风无敌手，新语是人知。”（《赠张太祝》）张籍在《祭退之》的五言古诗中也颇为得意地自诩“公文为时师，我亦微有声，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唐以后的诗评家或赞扬张籍的诗“思深而语精”；或认为张籍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王安石）“凄惋最甚，虽多出瘦语而俊拔独擅，贞元之后，一人而已。”（徐献忠《唐诗品》）张洎说得更玄，“元和中，张水部为格律诗，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项斯诗集序》）及至当代，著名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教授在他们的名著《中国诗史》中也指出：“至于与元白同时的，人数虽多，然以张籍为最重要。…在继承杜甫内容的诗人中，他可与元、白鼎足而三。”并指出“张籍的位置视元稹是无庸多疑的。”肯定张诗的成就不在元稹之下。

当我们检阅历代诗话，从中可以看到对张籍的诗持批评态度的亦

颇不少。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虽指出张籍的诗“思深而语精”，但又指出：“元(稹)、白(居易)、张籍诗，皆自陶(潜)阮(籍)中出，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本不应格卑，但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遂成冗长卑陋尔。”“张律诗虽有味而少文，远不逮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格卑”，“卑陋”，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魏泰则认为新乐府是“恶诗”。他在《临汉隐居诗话》中指出：“唐人亦多为乐府，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详，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发笑，此诚不足以宣讽。……甚者或谑怪，或俚俗，所谓恶诗也，亦何足道哉！”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对张籍的诗则彻底加以否定。他说：“人情物态，不可言者最多，必尽言者，则俚矣。知能言之为佳，而不知不言之为妙，此张籍、王建所以病也。张籍小人之诗也，俚而佻。”“张籍、王建诗有三病：言之尽也，意之丑也，韵之痺也。言穷则尽，意衰则丑，韵软则痺。”当代著名学者钱仲书在《谈艺录》中也认为：“然张之才力，去韩(愈)远甚；东坡《韩庙碑》曰：‘汗流籍湜走且僵’，千古不易之论。……其诗自以乐府为冠，世拟之白乐天、王建，则似未当。”

历代诗评家对张籍的诗可谓毁誉参半。对一个作家的作品看法不一，这是很正常的。当然，誉之者难免有溢美之词。张籍是韩愈的得意门生和挚友，又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和积极参加者，韩愈、白居易对他推重备至是理所当然的。贬之者也难免有偏颇之处，因为这取决于不同的政治观点、审美情趣。何况新乐府诗或曰元和体(广义的)其特质就是求变，即“恶同喜异”。在变革的过程中，改革派遭到非议是可以理解的，连《国史补》的作者李肇也认为“元和之风尚怪”，何谓“怪”？怪，奇异、罕见，乃变革中出现的新诗风也。

我不主张搞什么元张优劣论、张王优劣论，也不主张为元、白、张、王等人排位次，这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我觉得剖析一下造成这种分歧的症结倒是很有意思的。从历代诗话中对张籍诗作的品评来看，绝大部分是从语言艺术方面着眼的，真正从内容、风格方面认真

加以分析的评论并不多，有的人根本没有涉及。正象他们批评张籍的诗“浅露”一样，他们对张籍的评述也是很浅露的。事实上，张籍的思想、风格、语言、手法远比他们的定评要复杂得多。

(二)

张籍的诗最有特色的是乐府。韩愈、白居易推重他的是乐府；宋代诗评家赞颂他的乐府“杰出”，（许夔《彦周诗话》）“清丽深婉”，（刘攽《中山诗话》）“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竹坡诗话》）元人范德机在专讲“诗法”的《木天禁语·乐府篇法》中也把张籍列入榜首，编选《张司业诗集》（《四部丛刊》本）的明人刘成德看重他的首先也是乐府。“其诗自以乐府为冠”，当是千古不易之论。

张籍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卒于唐文宗大和四年(830)，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七朝。这一阶段正是唐朝社会大动荡，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时期。八年安史之乱，使中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生产停顿，社会劳动力大量丧失；战乱平息之后，又导致方镇林立，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在朝廷，宦官擅权，朋党倾轧，朝政更加腐败；为平定安史之乱，唐朝中央将河西、陇右、朔方诸镇军队东调，造成西边空虚，吐蕃乘虚而入，不仅西域力量大大削弱，连关中也难确保无虞。边患频仍，战祸不已。安史之乱，人民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战乱以后，方镇割据，唐朝中央管辖的地盘逐步缩小，兵饷赋役的负担则日益加重，而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更遭受着苛捐杂税的残酷压榨，加上官僚、贵族、商人兼并土地，迫使大量农民逃亡。当时的唐朝可谓内忧外患、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再从当时的文坛来看，腐败的政治风气必然要影响文坛的风气，“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作品多为游离现实、点缀升平之作，亦即

李肇所指的“大历之风尚浮”（《国史补》）。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白居易《采诗官》）张籍的新乐府就是属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的作品。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宗教、风俗等各个方面，广泛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思想倾向十分鲜明，揭露现实极其深刻，抨击黑暗异常猛烈。揭露官府横征暴敛、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有《野老歌》、《山头鹿》；描绘战祸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反对穷兵黩武的有《筑城词》、《征妇怨》、《凉州曲》，反映豪强霸道、仗势欺人、骄横强暴、鱼肉百姓的有《猛虎行》；控诉在钱重货轻、税外加征的残酷剥削下，农民难以负担沉重的赋税，被迫逃亡外流，弃农从商，妇女在家从事副业仍难维持生计的有《促促词》；揭露和鞭挞采药求仙、醉心畋猎的帝王、恃势杀人的“羽林”，笔锋直接指向腐朽糜烂的朝廷的有《求仙行》、《楚妃叹》、《楚宫行》；揭露战乱以后朝廷四分五裂，外族入侵，方镇只顾自保，无人领兵护主的有《永嘉行》；描绘安史之乱始平，又遭回纥、吐蕃等外族洗劫后的长安、洛阳荒凉破败景象的有《废宅行》、《董逃行》。除了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以外，张籍还怀着强烈的忿懣之情为妇女的悲惨命运鸣不平，对不合理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其代表作有《离妇》。张籍还把当时平民百姓的哀愁疾苦诉诸笔端，在他所描述的对象中，有丈夫远戍边疆一去不返的“征妇”，有承欢侍宴、满腔哀怨、强颜欢笑的宫娥，有不堪劳役之苦、倒毙在长城之下的“壮丁”，还有天真活泼但却惧怕官家的牧童。在揭露、抨击黑暗的同时，张籍又从另一个侧面满怀同情地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他们坚强不屈的意志，如《采莲曲》、《樵客吟》、《寒塘曲》、《江村行》等。上面指的都是张籍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诗篇涉及的社会生活之广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同时，由于描写的真实性，揭露的深刻性以及哀时托兴、思深语精的艺术感染力，无异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一幅中唐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画卷，足以和“浮世绘”媲美。

刘成德在《唐司业张籍诗集序》中指出：“其乐府诗景真情真，有风人之意。”应该说此论是公允的。的确，张籍乐府诗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真”。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百态，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弊端，真实地直抒自己的胸臆。描绘虽避免不了艺术的夸张，但符合历史的真实；语言虽多率直之词，但讲的都是真话。当然，景真首先必须情真，诗的根本是“情”，情真才能做到情景交融，以情感人。张籍出生于和州乌江若湖的一个贫寒农家，尽管曾经进士及第，但踏入仕途三十多年，授任的都是闲曹卑官，宦海浮沉，怀才不遇，穷愁潦倒，郁郁终生。张籍在青年时代，又曾出游过晋、冀、鲁、豫、陕、苏、浙、赣、湘、鄂直到岭南诸地，这就使得他能够广泛接触社会的底层生活，同情劳苦百姓，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激发了诗人的不平之情。特别是张籍所处的时代，德、宪二宗即位之初，颇想励精图治，在士大夫中萌发起唐室中兴之望。张籍和他的志同道合的诗友们，对国势安危、民生荣瘁表示了更多的关切，然而好景不长，建中改革、贞元改革相继失败，诗人的抱负难以施展，更驱使诗人将心中的不平和愤慨之情一吐为快。这就是张籍乐府诗中批判性和反抗性内容的天然合理性所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心态。这也使得张籍能够接受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积极参加新乐府运动，发挥诗歌对封建帝王的规讽或所谓美刺的作用，以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世情”，匡救时弊，救世劝俗的目的。正是由于自然客观作用于诗人的主观，“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而兴于叹咏。”（白居易《与元九书》）张籍才写出那么多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诗篇。

历代不少诗评家都批评张籍的乐府诗“浅露”、“太尽”、“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其实，“露”、“尽”，并不是张籍乐府诗的缺点。露，一针见血；尽，酣畅淋漓，读起来岂不使人感到痛快！白居易提倡讽喻、美刺就是主张激切和直露的，张籍的乐府诗是实践了这一主张的。所谓“浅露”、“太尽”、“以意为主，而失于少文”云云，实际上是按照传统的儒家诗教来衡量张籍乐府诗的。按照儒家

的要求，诗的讽喻、美刺应该止于“礼”，应该“微而婉”，“怨而不怒”。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张籍的狷直，他以疗救时弊、改革诗风为己任，不沿袭古题，不随波逐流。

但是，张籍的狷直，毕竟是以道自守的。他的诗是“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就是说他咏叹政教的得失、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是为了“海贪暴臣”，“讽于佚君”，“尽欢怨之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元次山集》卷二《系乐府十二首序》）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在他的诗中，不论是抨击为害人民的贪官，还是蒙蔽君主的奸佞，锋芒都是尽量避开皇帝的。在《永嘉行》中，他不揭露肃宗、德宗的昏聩腐败，而着眼于“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在《董逃行》中他也不抨击玄宗的荒淫误国，而把矛头指向攻入洛阳的叛军（这也是应该抨击的），并对东都宫殿被焚流露出深沉的惋惜之情。即使是一些明显“讽上”的诗篇，如《吴宫怨》、《楚宫行》，也都运用“引古刺今”的表现手法。新乐府是强调“其言直而切”的，但涉及到对君王的讽谏，“切”则切矣，而“直”就不那么直了。白居易说过这样一段话：“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以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所“刺”的对象，有“难以指言”而隐寓其人者，自然是包括皇帝在内的。何况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既“为君、为臣”，又“为民、为物”的仁政的，这种善良愿望实质上是超阶级的幻想。当然，我们不应也不能苛求生活在九世纪的中唐、并为唐王朝效力的张籍，但是，在研究张籍的乐府诗时，我们必须看到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和张籍的乐府诗所存在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三）

张籍以道自守，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处世之道。他盼望腾达，以实现他的抱负，然而却穷困终生，不被赏识，因

此，在他的思想上始终交织着“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何以在他的诗中，既反映出一展抱负、充满信心的乐观向上精神，也流露出不受重用、怀才不遇的消极低沉思想。

张籍是重视仕途经济的。在“七品小吏”的任上，他企盼着能够受到朝廷的重用，以实施他所主张的仁政。当他出仕在家闲居时，他不甘寂寞沉沦，盼望早日出山，以报效国家。他对前途有时满怀信心和希望。暮春三月，落英缤纷，骚人墨客惋惜香消红沉，他却以花自喻写道：“残花在犹稀，青条耸复直。为君结芳实，令君勿叹息。”（《惜花》）他勉励自己“明时未中岁，莫便一生闲。”他希望受到皇帝的青睐，讲了许多歌功颂德的话，连京都长安也被称颂为“舜城”。对受到皇帝封赐的大臣，朝官叙谒，恩使喧迎，闾阖晓开，受册御殿，他都仰慕钦羨。（见《田司空入朝》）他曾受到皇帝的召见和赏赐，一次是寒食内宴，一次是朝日敕赐百官樱桃，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他眼中的内苑是“朝光瑞气满宫楼”，他面前的皇帝是“千官尽醉犹教坐”；宴会散后，他兴奋不已，“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皇帝赐给的樱桃比作人间未有的“仙果”，感恩戴德地表示“愿得千春奉至尊”。在他的诗中，许多是和裴度、令狐绹等人的酬应唱和之作，颇多阿谀、奉承之词。裴度、令狐绹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朝宰相，又雅好诗词，张籍巴结他们，恭维他们，当然是希冀受到他们的赏识、举荐。张籍对大唐王朝忠心耿耿，一直抱着希望。东平节度使李师道拉拢他，他以“节妇”自喻，不为所动。他的传诵千古的名句“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就是为婉言谢绝李师道而写的。他还以朱鸢喻人，“谁知豪家网尔躯，不如饮啄江海隅”，告诫自己，不要因贪图饵食，而上方镇的圈套。这里表现出张籍“贫贱不能移”的高贵品质，也反映出他的矢志不移的忠君思想。

但是，冷酷的现实和张籍的强烈愿望恰恰背道而驰。张籍三十岁进士及第，仅被授了一个“掌出纳神主、祭祝则跪读祝文”的太常寺

太祝。此后近三十年，浮沉宦海，虽受到韩愈的赏识和举荐，但担任的都是闲曹卑官，直到临终前两年（文宗大和二年）才被授为国子司业，碌碌一生，境况始终没有大的改变。张籍中年患严重眼疾，朋友称他为“穷瞎张太祝”，他贫病交加，穷得连治疗眼疾的钱也拿不出来，而由韩愈代他写信给浙东观察使李逊请求资助。他描绘自己的境况，“雨中愁不出，阴黑昼连宵。屋湿唯添漏，泥深未放朝。无鸟怜马瘦，少食信儿娇。”（见《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见《赠任懒》）当不是故作姿态，无病呻吟。在处境日益窘迫、抱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强烈的愿望又淡化成消沉的意志，而产生绝望、幻灭之感。他时而把自己比作在泽土中不长的青松，感叹“漏天日无光，泽土松不长”；“无人识高韵，荐于天子傍”；“况我愚朴姿，强趋利名场，远同于贵人，自举固难彰”。（见《赠姚怱》）时而又自惭形秽，把马“人化”，而发出“乍离华厩移蹄涩，初到贫家举眼惊”的感叹。（见《谢裴司空寄马》）时而又把自己比作被君王遗弃的后妃，唱出“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开月长满”的绝望的悲歌。愁肠千结，万念俱灰，争什么名，夺什么利，“好”便是“了”，他甚至消极悲观到写下“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这样的诗句（见《北邙行》）。既然不能“达则兼济”，那就只好退而“独善其身”。于是，寄迹山林，纵情诗酒，有时感到百无聊赖，则和诗友们在繁华的、绿杨垂荫的长安朱雀大街上踟蹰、徜徉。“心如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似乎六根清静，脱离红尘，飘飘然若仙了。对张籍来说，这真是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诗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诗更可靠的途径。

张籍的诗中有不少是描写道教活动的。他是反对释老之道的，“夫老释惑乎生人久矣，诚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尔。”他对唐朝皇帝推崇道教，求仙炼丹在上层社会中形成一时之风尚极为不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学仙》中他揭露“药成既服食，计日乘鸾凤。虚空无灵应，终岁安所望。勤劳不能成，疑虑积心肠。虚羸生疾疹，寿命多天伤。身歿惧人见，夜埋山谷傍。求道

慕灵异，不如守寻常。”在《哭丘长史》中他写道：“曾是先皇殿上臣，丹砂久服不成真。常骑马在嘶空枥，自作书留别故人。诗句遍传天下口，朝衣偏送地中身。最悲昨日同游处，看却春风树树新。”对道教炼丹求仙的欺骗性、虚伪性以及因食用丹药而夭伤的愚昧性，刻划得可谓入木三分，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他还写了一首《玉真观》：

“台殿曾为贵主家，春风吹尽竹窗纱。院中仙女修香火，不许闲人入看花。”这首诗语义双关，皮里阳秋，只要拨开那层“竹窗纱”，就不难窥见唐朝王室的那些公主们利用道观自由自在地纵情淫乐的丑恶场景，这实在是一首绝妙的讽刺之作。但是，在张籍的身上又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既然他对道教抨击得如此猛烈，何以在他的五、七言诗中又有不少是和道士交往、惜别之作，在他的朋辈中不仅有一些道士、山人，而且他还非常羡慕道观清静无为的生活，“闲房暂喜居相近，还得陪师坐竹边”。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乃是在仕途失意以后，企求解脱的消极思想的具体反映。

张籍乐观奋发，但又消极避世；对唐王朝寄予希望，但又感到绝望；反对道教的恶行，又羡慕道教的生活；一面埋怨朝廷不予重用，一面又表白自己不想做官。入仕与归隐，抨击与奉承，高雅与庸俗，这一切矛盾都是围绕着“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修身处世之道而产生的。弄清了这个脉络，我们对张籍其人及其诗的风格就会明晰起来，正象歌德说的，“明晰是光线和暗影的恰当分布”。

(四)

张籍的乐府诗已有定评，哀时托兴，思深语精，清丽深婉，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他的绝句和律诗又怎样呢？从历代诗话来看，对他的五言诗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平淡可爱”。对他的七言诗，有人认为“质多文少”，有人认为“虽有味而少文”，即思理见胜，情采欠佳。或者说丰神情韵不足，艺术感染力不强。这里又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何以同出于一人之手的诗作，仅仅由于体裁不同，其风格竟会